

对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质疑： 理论、实证及再拓展

史焕平 沈鑫伟

(华东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新剑桥学派理论是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利润率越大,国民收入中利润的比例就越大,作为工资收入者所得的工资的比例就越小,因而必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个理论对我国当前经济高速增长下如何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提出了挑战。因此,在宏观经济运行背景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从理论上证明经济增长可以减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如何更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新剑桥学派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4)02-0072-08

DOI:10.13764/j.cnki.ncds.2014.02.012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出现了奇迹般的高增长,居民整体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统计计算的我国基尼系数均已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1]。因此,正确认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至关重要,也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质所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本文首先对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回顾,然后进一步从理论上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进行分析,再用我国的相关数据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对库茨涅茨提出的“倒U型”假说提出一些拓展性思考。

一 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回顾

以琼·罗宾逊、卡尔多、帕西内蒂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Neo-Cambridge School)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新剑桥学派师承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

析;坚持有效需求原理;强调投资支出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决定作用^[2]。正因为如此,他们自命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嫡传。他们将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第24章中关于社会哲学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入化。当然,卡莱斯基在1935年以波兰文发表的几乎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相同的理论也对新剑桥学派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也因此,罗宾逊说过“卡莱斯基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更为真正的‘通论’。”^[3]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在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为新剑桥学派提供了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新剑桥学派在经济理论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分析方法上采用历史观,抛弃新古典综合派主张的均衡观;二是特别注重收入分配问题。在收入分配方面,新剑桥学派认为关键在于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是如何变动的,其变动应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而变动。

新剑桥学派从价值理论出发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主要是想表明三个极其重要的观点:

第一,收入相对份额的大小,在一定的收入水平

收稿日期:2014-0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JY173)。

作者简介:史焕平(1963-),男,江苏宜兴人,经济学博士,教授,从事货币经济学、金融学和产业经济学研究;沈鑫伟(1988-),男,浙江湖州人,2011级产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条件下取决于利润率水平,而利润率水平是与生产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收入分配形成的结局具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它不仅和历史上形成的财产占有制度有关,而且和劳工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工资收入者的货币工资率取决于外部条件,如一国历史上形成的工资水平、国内劳资双方议价力量的对比等。利润收入者的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凭借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因此,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绝不是公平的、合理的,而是取决于劳工集团和资本集团各自的谈判权力。这些充分体现出新剑桥学派强调的是所有权和历史因素。

第三,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认为它不能反映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①。新剑桥学派认为这是一种循环推理。新剑桥学派主张的是回到新古典经济学以前的理论中去,也就是回到李嘉图理论中去。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通过与收入分配相联系,着重分析收入分配的变动如何影响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储蓄率,以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G = \frac{S}{C} = \frac{\left(\frac{P}{Y} \cdot S_p + \frac{W}{Y} \cdot S_w\right)}{C} \quad (1)$$

在上式中, G 为经济增长率, S 为储蓄率, C 是资本-产量比率。国民收入分为利润与工资两部分, $\frac{P}{Y}$ 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frac{W}{Y}$ 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所以 $\frac{P}{Y} + \frac{W}{Y} = 1$ 。 S_p 是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 S_w 是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一般情况下 $S_p \geq S_w$ 。

根据这一公式,新剑桥学派认为:

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

高,利润率越大,国民收入中利润的比例就越大,作为工资收入者所得的工资的比例就越小。因此,经济增长不利于占人口多数的工资收入者,必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重要结论。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病症正在于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因此,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改进收入分配制度就应该放在消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的首要地位。

第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途径不是实现经济增长,而是实现收入均等化。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途径是实现经济增长。新剑桥学派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经济增长不仅造成了污染、通货膨胀等问题,不仅使工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减少,而且还造成了绝对贫困。

从对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同时产生的,或是互为条件的。这就使得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缩小成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果真如此吗?

二 同步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理论分析

如上文所述,新剑桥学派理论是在凯恩斯理论^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是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y)。也就是只要有资本组织生产,是不需要考虑销售的,包括国内和国外。所以当时只要动员更多的储蓄,同时通过银行机构和金融市场将储蓄转变为投资,则经济就能够不断增长。所以,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是资本的短缺问题和产品的短缺问题。从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的基本公式中可以看到,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则要提高储蓄倾向相对较高的利润收入者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所以,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贫富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

^①新古典综合派常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例,该生产函数的形式是 $Y = AL^\alpha k^{1-\alpha}$,由于生产函数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率,分别对 L 和 K 求 Y 的偏导数,得出 $\frac{\alpha Y}{\alpha L} = \alpha(Y/L)$ 和 $\frac{\alpha Y}{\alpha K} = 1 - \alpha(Y/K)$,表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量决定了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份额。

^②凯恩斯的理论就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该理论纲要有:(1)国民收入决定于消费和投资;(2)消费由消费倾向和收入决定;(3)消费倾向比较稳定,因此国民收入的波动主要来自投资的波动;(4)投资由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决定;(5)利率决定于流动偏好与货币数量;(6)资本边际效率由预期收益与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或者说重置成本决定。详情请参见高鸿业著《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09页。

而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从目前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背景看,已经从原来的短缺经济转变成了过剩经济(surplus economy)^①,大部分国家产能过剩,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消费不足,但与此同时,却又有许多资金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所以,如何扩大消费带动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即当今经济增长的约束已经由短缺经济时代的资源供给约束转变为消费需求约束。

因此,笔者引入反映消费引致投资的乘数-加速数原理^②,从而更好地解释在现今的经济状况下,促进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总是大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大体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减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促进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新剑桥学派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即效率和公平不可兼得,在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环境污染、通货膨胀等问题后,新剑桥学派主张放弃经济增长,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途径不是实现经济增长,而是实现收入均等化,本文再次对工资性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析,最终得出结论: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可以兼得。

(一) 边际工资分配倾向的定义

根据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封闭条件下)有:

$$Y = C + I \tag{1}$$

新剑桥学派认为国民收入可以表示为:

$$Y = Y_w + Y_p \tag{2}$$

Y_w 代表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 Y_p 代表国民收入中利润性收入,结合(1)、(2)两式得出:

$$Y = Y_w + Y_p = C + I = C_w \cdot Y_w + C_p \cdot Y_p + I = C_w \cdot Y_w + C_p \cdot (Y - Y_w) + I \tag{3}$$

C_w 、 C_p 分别代表工资性收入者和利润性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3)式整理后得出:

$$Y = \frac{C_w - C_p}{1 - C_p} \cdot Y_w + \frac{1}{1 - C_p} \cdot I \tag{4}$$

设 $\frac{C_w - C_p}{1 - C_p}$ 为 α , $\frac{1}{1 - C_p}$ 为 β , 简化后得:

$$Y = \alpha \cdot Y_w + \beta \cdot I \tag{5}$$

两边微分后得:

$$\Delta Y = \alpha \Delta \cdot Y_w + \beta \Delta I \tag{6}$$

整理后得到:

$$\Delta Y = \frac{\beta}{1 - \alpha \cdot \frac{\Delta Y_w}{\Delta Y}} \cdot \Delta I \tag{7}$$

定义 $\frac{\Delta Y_w}{\Delta Y}$ 式子中为边际工资分配倾向,表示国民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工资收入的增长。显然,当边际工资分配倾向增加意味着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逐渐减小。

(二) 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工资分配倾向($\frac{\Delta Y_w}{\Delta Y}$)的关系

因为(1)式,所以有 $\Delta Y = \Delta I + \Delta C$,将之代入(6)式后整理得:

$$\Delta Y = \alpha \Delta Y_w + \beta(\Delta Y - \Delta C) \tag{8}$$

两边同除以 ΔY ,有

$$1 = \alpha \cdot \frac{\Delta Y_w}{\Delta Y} + \beta \cdot (1 - \frac{\Delta C}{\Delta Y}) \tag{9}$$

将 α 、 β 代入整理得:

$$\frac{\Delta C}{\Delta Y} = \frac{\Delta Y_w}{\Delta Y} \cdot C_w + (1 - \frac{\Delta Y_w}{\Delta Y}) \cdot C_p \tag{10}$$

上式表明,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 C_q 是两种边际消费倾向(C_w, C_p)与各自边际分配倾向($\frac{\Delta Y_w}{\Delta Y}, 1 - \frac{\Delta Y_w}{\Delta Y}$)的加权之和,且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随工资性收入分配的增加而增加。

一般地, $C_w > C_q > C_p$, C_q 代表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显然,提高工资性收入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从而增加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三) 工资性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1. 理论推导

令 $\frac{\Delta Y_w}{\Delta Y} = w$, 代入(7)式并引入时间序列,得到

$$\Delta Y_t = \frac{\beta}{1 - \alpha \cdot w_t} \cdot \Delta I_t \tag{11}$$

w_t 代表 t 期的收入分配政策,引入乘数-加速数原理:令 μ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 Y_{t-1} 为 t 的上一期的国

①短缺经济是指经济发展中资源、产品、服务的供给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一种经济现象。也就是“求大于供”,它与过剩经济相对,过剩经济是指“供大于求”的现象。最早由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提出。

②萨缪尔森在1939年发表的《乘数分析与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一文中,将乘数理论与加速数原理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乘数-加速数原理”的动态经济模型,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和波动幅度。

民收入,根据汉森的假设^①:

$$C_t = \mu Y_{t-1} \quad (12)$$

即 t 时期的消费支出是 $t-1$ 时期国民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乘积。

令 ν 代表资本-产出比率或加速数,则 t 时期私人引致投资是 t 时期的消费支出 C_t 与 $t-1$ 时期消费支出 C_{t-1} 之差与 ν 的乘积^②,即:

$$I_t = \nu(C_t - C_{t-1}) = \mu\nu(Y_{t-1} - Y_{t-2}) \quad (13)$$

两边微分后得:

$$\Delta I_t = \mu\nu(\Delta Y_{t-1} - \Delta Y_{t-2}) \quad (14)$$

将(14)式代入(11)式得:

$$\Delta Y_t = \frac{\beta\mu\nu}{1 - \alpha \cdot w_t} \cdot (\Delta Y_{t-1} - \Delta Y_{t-2}) \quad (15)$$

因为 $Y_t = (1 + G_t) Y_{t-1}$, 所以 $\Delta Y_t = (1 + G_t) \Delta Y_{t-1}$, G_t 表示 t 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将(15)式两边同除以 ΔY_{t-1} 得到:

$$\frac{\Delta Y_t}{\Delta Y_{t-1}} = \frac{\beta\mu\nu}{1 - \alpha \cdot w_t} \cdot \left(\frac{\Delta Y_{t-1} - \Delta Y_{t-2}}{\Delta Y_{t-1}} \right) \quad (16)$$

$$1 + G_t = \frac{\beta\mu\nu}{1 - \alpha \cdot w_t} \left(1 - \frac{1}{1 + G_{t-1}} \right) \quad (17)$$

$$G_t = \frac{\beta\mu\nu}{1 - \alpha \cdot w_t} \left(1 - \frac{1}{1 + G_{t-1}} \right) - 1 \quad (18)$$

2. 比较及分析

如前文所述,由于大部分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背景已经从短缺经济转变成成为过剩经济,过去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许已经成为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中间式,如何挖掘新的消费需求、鼓励创新等已经成为企业和资本生存的首要问题。下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减小收入差距促进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18)式可以发现,假设 $G_{t-1} > 0$, 那么 G_t 将随着 w_t 的增大而增大,即意味着随着边际工资分配倾向的增大,收入分配差距开始减小,同时经济增长率也不断增大。新剑桥学派虽然强调其重点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问题,即分析方法的历史观。但是在实践中,它在证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并没有引入历史分析方法,只是在理论的承接上遵循了自己所谓的历史观。这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导致了最后不合理的结论。

在这里,笔者并没有完全否定新剑桥学派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在 $G_{t-1} < 0$ 时, G_t 将随着 w_t 的减小而增大,即意味着随着边际工资分配倾向的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开始增大,同时经济增长率却不断增大,似乎新剑桥学派的主张在这里又有其合理性。但是,不妨再进一步深入探析:当前一个过程完成以后,经济增长也许已经从负开始变成正向,如果没有马上,至少总有一天会变正。因此,此时不能再重复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过程, $G_{t-1} > 0$ 的过程,即通过减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开始发挥作用,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具有可持续性。也许罗宾逊夫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她指出“增长绝不是稳定的,假如资本家的高利润不是高积累率的结果,而是垄断的结果,那么由于工资没有相应的提高,社会消费需求水平的增加将受到阻碍,从而进一步制约了投资需求,使得在高利润的条件下出现投资缩减和经济停滞的趋势,这时必须通过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来使得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从而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矛盾,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③

尽管新剑桥学派并没有得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减小可以同时产生的结论,但是它提出了减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正确主张,虽然新剑桥学派认为缩小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把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当成是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矛盾的手段^[4-5]。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这个矛盾解决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又可以撇开甚至抛弃。因此,在这种两难抉择下,新剑桥学派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途径不是实现经济增长,而是实现收入均等化。而发展才是硬道理。根据笔者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实现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相反收入分配差距的减小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更加有效和具有可持续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笔者与新剑桥学派的结论是殊途同归,不同的结论却是相同的政策主张:都认为应该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两者对减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罢了。

3. 对(18)式的进一步分析

^①阿尔文·汉森认为,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只说明了一定的投资如何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变化,而没有说明消费的变动如何反过来引起投资的变化;此外,凯恩斯的理论属于比较静态分析,没有考虑从原有均衡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调整过程。他认为,只有将加速数原理与乘数理论结合起来考察两者在动态序列中的作用,才能说明经济周期的累积性扩张或紧缩过程。

^②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3版),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0页。

^③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儿《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5页。

在 (18) 式中, 令 $\frac{\beta w}{1 - \alpha \cdot w_t} = x$, 则, $\frac{dx}{dw_t} = \frac{\alpha \beta w}{(1 - \alpha w_t)^2} \frac{dG_t}{dx} = 1 - \frac{1}{1 + G_{t-1}}$, 两式相乘得:

$$\frac{dG_t}{dw_t} = \frac{\alpha \beta w}{(1 - \alpha w_t)^2} \left(1 - \frac{1}{1 + G_{t-1}}\right) \quad (19)$$

可见, 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 当期的收入分配政策应当考虑前期的经济增长率。

当 $1 - \frac{1}{1 + G_{t-1}} > 0 \Rightarrow G_{t-1} > 0$, 即当前一年的经济增长为正时, $\frac{dG_t}{dw_t} > 0$, 即表示经济增长率随着边际工资分配倾向的增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减小)而增大, 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只有扩大工资性收入分配倾向, 也就是要增加工资性收入的分配比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工资性收入比重没有提高, 政府为了防止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采取紧缩政策, 然而此时企业由于利润性收入的增加, 借款投资的压力减小, 这种紧缩政策的效果将不会很明显, 通胀可能会继续。根据以上公式, 随着工资性收入的减少经济将下滑, 这也许就是滞胀的来源。

当 $1 - \frac{1}{1 + G_{t-1}} < 0 \Rightarrow G_{t-1} < 0, \frac{dG_t}{dw_t} < 0$, 即当前一年的经济增长为负时, 也即表示经济增长率随着边际工资分配倾向的减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大)而增大, 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要求减少边际工资分配倾向, 增加利润性收入, 从而扩大储蓄, 进而通过利息率的调节扩大投资比重, 促进经济增长。此时, 经济通常处于萧条时期, 由于工资具有刚性, 所以在经济萧条时减少工资分配比较难, 尤其是在工会发达的国家^[6]。所以, 在这个阶段减少转移支付, 加大对投资的政府补贴, 相对减少了边际工资分配倾向同样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是通过绝对减少了工资分配倾向实现的(表现为农业价格与工业价格的剪刀差), 而美国 19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政策则采取了后者, 即通过政府加大投资实现的^[7]。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 当经济增长时, 为了防止通胀, 就需要调节投资。增加边际工资分配倾向并不意味着投资绝对下降了, 只是投资的增长率降低了, 这样有利于降低泡沫经济的形成速度和可能性, 使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更加牢固。通常情况下, 提高工资率并不那么容易, 包括制度因素、人为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都会阻碍工资率的上升^[8], 而利润性工资上升比较容易, 这样, 投资的增长导致缺乏有

效需求的消化, 引发经济从繁荣到衰退最终进入萧条^[9]。如果在繁荣时, 增加政府消费, 增加转移支付并同时增加税收, 可以使经济逐步降温, 实现软着陆。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 不幸使经济进入萧条, 我们知道在这样恶劣的经济条件下, 期望通过实行剪刀差, 即让工资率继续下降以弥补利润率下降导致的投资增长率下降, 在工会组织发达的社会相当艰难, 最好的办法是增加政府投资, 若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 那么可以通过发行政府公债实行赤字财政。

我们这里要搞清的是工资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绝对工资下降了, 在绝对工资不下降, 但工资率下降的前提下, 维持经济的发展是具有可能性的^[10]。说明这一点是为了解释在经济萧条时下降工资率, 实行剪刀差的政策是有效的, 这种让穷人更穷的办法在这个阶段是起作用的, 但不具有可持续性, 因为在经济恢复以后, 即经济保持正的增长以后, 若还继续使工资率下降或保持不变, 此时经济又将逐步进入下一个周期。

因此, 边际工资分配倾向的调节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经济增长时, 要根据经济增长同步提高边际工资分配倾向, 在经济萧条时, 最好增长政府投资, 同时保持边际工资分配倾向不变, 因为在这种状况下还要降低边际工资分配倾向会让老百姓感到更痛苦, 引起的社会矛盾也会更多。总之, 降低边际工资分配倾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短暂的, 而提高边际工资分配倾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久的, 并且是可持续的。

三 实证分析及“倒 U 型”曲线的思考

“倒 U 型”曲线是库茨涅茨于 1955 年提出的, 用来表示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该曲线近似抛物线形状^[11]。因此, 本文在建模时采用抛物线方程。

(一) 样本与数据

本文利用我国 1994—2010 年的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和人均 GDP 作计量分析, 其中基尼系数的数据摘自国家统计局。

(二) 模型设定和实证结果

设定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为 CN, 人均国民收入为 X, LNX 表示对人均 GDP 取对数, 构建计量模型(抛物线方程)

$$CN = \beta_0 + \beta_1 LNX + \beta_2 LNX^2 + \varepsilon$$

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CN = -4.89 + 1.07LNX - 0.053LNX^2$$

t(-4.67) (4.75) (-4.42)

R² = 0.91 F76.44 D · W = 1.250 448

我们看到,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与人均 GDP 对数的拟合程度都在 90% 以上,各个系数的 t 值都显著。根据样本数量为 17,自变量个数为 2 以及 1% 的显著性水平下 DW 的临界值 1.25(根据易丹辉版的《数据分析与 EViews 应用》查表所得)^[12]。所以,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与人均 GDP 的拟合中自变量不存在一阶自相关。

观察回归方程,发现这个方程其实就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即与库茨涅茨的“倒 U 型”曲线基本吻合。

(三) 由“倒 U 型”曲线引发的思考

1. “倒 U 型”曲线的左边真如抛物线的左边一样么?

通过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笔者试图对“倒 U 型”曲线的左边(世界经济似乎还没有经历过右边^①,有没有右边、右边怎么样还只是猜想)提出一些拓展性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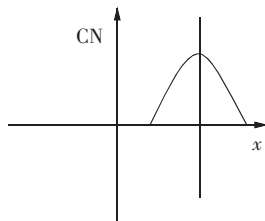


图 1 倒 U 型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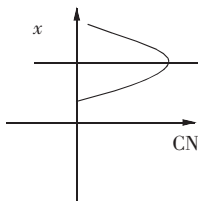


图 2 横轴和竖轴互换后的曲线

图 1(CN 表示基尼系数,x 人均 GDP,下同)就是所谓的“倒 U 型”曲线,图中中间的竖直线表示抛物线的对称轴。如果将图 1 的横轴和竖轴互换,可以得到图 2。从图 2 可以看到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大,人均 GDP 不断增大,同时该曲线的斜率也不断扩大,意味着人均 GDP 的增长率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大而不断增大。考察了我国 1981—2010 年的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以及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的变化,笔者发现这一点似乎与实际不相符。人均 GDP 的增长率并没有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大而增

大,相反在一些年份基尼系数与人均 GDP 增长率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向关系。

2. “倒 U 型”曲线的左边到底是怎样的?

在上文的理论分析部分,最后得出了这个公式:

G_t = $\frac{\beta w_t}{1 - \alpha \cdot w_t} (1 - \frac{1}{1 + G_{t-1}}) - 1$, 因此得出大致如图

3 的图像。1/α 是图 3 中竖线与横轴的交点的横坐标。图 3 只考虑了经济增长率 G_t > 0 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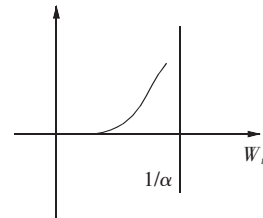


图 3 关于公式(18)的曲线

这里 G_t 表示经济增长率,W_t 表示边际工资分配倾向,可见 W_t 越往右说明边际工资分配倾向越大,由此可缩小贫富差距。随着 W_t 的增大,经济增长率不断增大,即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减小,经济的增长率会变大。这种理论解释恰好符合之前用实际数据验证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与人均 GDP 增长率变化的关系。因此,“倒 U 型”曲线的左边可能如图 4 所示,这样再进行横轴与竖轴变换后得到的基尼系数与人均 GDP 的图 5 符合实际意义,即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大,人均 GDP 增长率没有变大,尽管人均 GDP 在变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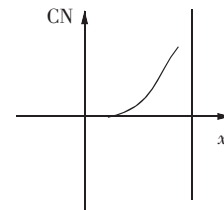


图 4 猜想的“倒 U 型”曲线的左边 (注:与图 1 的左边曲线凸向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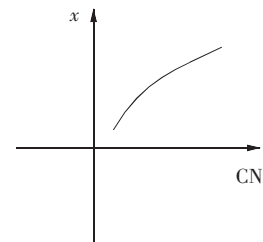


图 5 将图 4 横轴与竖轴互换后的曲线

①左右两边以图中竖直线为界,竖直线左边即为“倒 U 型”曲线的左边,竖直线右边即为“倒 U 型”曲线的右边。

3. “倒 U 型”曲线的右边是怎么样的?

没有人知道“倒 U 型”曲线的右边是怎么样的,即使回归发现了实证数据符合“倒 U 型”曲线,学者们也不敢妄加结论,因此多数学者最后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还走在“倒 U 型”曲线的左边,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差距虽然仍在扩大,但是扩大的速度会不断下降^[13-15]。

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有个谨慎的认识,如果两者的关系如图 4 所示(即使两者的关系真如图 4 所示,通过回归也是可以得到类似抛物线的曲线,因为我们得到的曲线并不 100% 的与实际数据拟合)^[16-19],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人均 GDP 增长率不断减小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收入差距将不断拉大,经济可能永远也无法达到理想的后边,后果将非常严重。所以,通过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人为手段去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显得如此重要。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对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该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提出了质疑,然后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再推导,同时运用我国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及进一步的拓展分析,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和启示:

(1) 在各国宏观经济运行背景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后,扩大消费已替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也即经济增长的约束已经由短缺经济时代的资源(特别是资本)供给约束转变为消费需求约束。这是新剑桥学派在当时理论分析时得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不可兼得的主要原因。

(2) 本文理论模型认为扩大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也即减少利润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与新剑桥学派相反的结论,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这样的“鱼和熊掌”可以同时兼得。

(3) 本文从消费需求拉动投资而不是提高储蓄率来拉动投资的角度来进行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符合当下经济背景,因此得出的结论对政策制定者具有指导性作用。

(4) 既然在经济增长的中途需要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来解决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矛盾,那么作为经济增长的初始禀赋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作用明显。

(5) 通过政府的调控手段,以政府政策或法律的规定使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合理化、制度化、规范化,这对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经济增长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也正是近几年我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努力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的一个理论依据。

(6) 中产阶级(工资性收入者)是产生社会消费需求的强大动力,因此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就是以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为目标,这样就不至于使整个社会出现消费断层,同时又能对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有效控制。

(7) 库茨涅茨的“倒 U 型”曲线只是统计意义上得到的结果,在实践中处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应以当时的实际情况为背景,并兼顾效率和公平。

参考文献:

- [1] 刘霖,秦宛顺. 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因果关系研究[J]. 福建论坛,2005(7): 72-81.
- [2] 蒋自强,史晋川.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2.
- [3] 琼·罗宾逊. 现代经济学导论[M]. 中译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81.
- [4] 陆万军.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J]. 经济学家,2012(5): 36-43.
- [5] Assadzadeh, A. S. Paul. Poverty, Growth and Redistribution: a Study of Iran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 23.
- [6] 李实.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J]. 经济研究,1999(4): 30-39.
- [7] Foellmi Reto, Zweimuller Josef. Inequality and Growth: European versus U. S Experiences [C].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Zurich,2003(6): 34-48.
- [8] 许冰,章上峰.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 U 型多拐点测度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2): 54-64.
- [9] Gary S. Fields. How Much Should We Care About Chang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7(4): 19.
- [10] Chang Juin-jen, Liu Chia-ying, Hung Hsiao-wen. Does 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Boost Economic Growth or Lead to More Income Inequality [J]. Econ Rec, 2013(284): 31.
- [11]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回到库茨涅茨假说[J]. 经济研究,2005(4): 13-21.
- [12] 易丹辉. 数据分析与 Eviews 应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5-110.

- [13]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Equal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2): 1-28.
- [14] 杨俊, 张宗益.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及库兹涅茨倒 U 假设再探讨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3(2): 25-33.
- [15] 桂魄. 从库兹涅茨收入分配说看居民收入差距 [J]. 当代经济, 2008(11): 154-155.
- [16] 丁任重, 陈志舟, 顾文军. “倒 U 假说”与我国转型期收入差距 [J]. 经济学家, 2003(6): 25-32.
- [17] 陈昌兵.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实证分析——基于有约束条件的 VECM [J]. 当代经济科学, 2007(1): 13-14.
- [18] 张少杰, 董碧松, 郭雅娴. 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实践验证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1): 17-22.
- [19] 程安林, 黎军. “库兹涅茨假说”新解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 19-24.

Skepticism for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Neo – Cambridge Schoo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Expanding

SHI Huan – ping , SHEN Xin – w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 Nanchang 330013 ,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Neo – Cambridge school is based on the Keynesian theory that under other conditions it remains unchanged; the greater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will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national income on profi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wage income will decrease , which is bound to exacerbate inequality at income distribution. This theory is a challenge on how to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educe the wealth gap for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urrent. Thus , how to prove that economic growth could reduce the income gap in the case of the macroeconomic background which has greatly changed is very important. On this basis , how to effectively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creas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Neo – Cambridge school

(责任编辑 刘雪斌)